

文章编号:1674-8107(2023)01-0121-08

冀中抗日根据地社会教育及当代启示

邵艳梅,王 霜

(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401)

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动员群众参战、提高群众的思想文化水平,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开展了以识字教育、政治教育、生产技术教育、军事常识教育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教育。其主要形式有开展冬学运动、建立民众学校、采用小先生制、开办技术训练班、建立文化俱乐部,在社会教育过程中形成了独有的特点。通过社会教育,提高了冀中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增强了民族意识,推动了抗日战争最终取得胜利,为当今开展社会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冀中抗日根据地;社会教育;启示

中图分类号:G7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22.03.015

社会教育是时代产物,不同时期有不同内涵。抗日战争时期社会教育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校教育以外的对于不能脱离生产的广大民众进行的教育。^{[1](P30)}冀中抗日根据地适应群众生产生活和战斗形势变化的需要,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社会教育,建立了相对成熟的社会教育体系,对启发民智、动员群众、激励参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冀中抗日根据地社会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冀中抗日根据地对广大群众开展社会教育是针对根据地的现实情况作出的战略选择。毛泽东曾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2](P509)}。抗战时期,为抗击日本侵略,夺取抗战胜利,要在最大范围内动员群众参战。但是冀中抗日根据地文化发展十分落后,文盲比重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加上日本侵略者在根据地极力进行文化侵略,抹杀人民群众的

爱国思想和抗战热情,严重影响着抗战动员和边区建设工作的开展。所以,通过广泛开展社会教育以削减文盲,动员民众参战、提高人民抗战信心,势在必行。

第一,是防止日伪奴化思想侵蚀的需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进行军事、经济侵略的同时大力开展文化侵略,通过宣扬“建设东亚新秩序”“共同防共”“共存共荣”等奴化思想来麻痹人民群众的民族意识,妄图使沦陷区成为殖民地。毛泽东曾把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政策分为两个层面:在物质层面上,掠夺人民的衣食;在精神层面上,摧残民众的民族意识,要求所有人当太阳旗下的顺民。^{[2](P423)}社会上,敌人利用带武装的汉奸随军组织宣抚班来大肆宣传奴化思想。每占领一处便利用演讲、办报、散发小册子等形式来宣扬“中日亲善”“王道乐土”思想,以印证日本侵华的合理性,实质是配合日本军事侵略来对人民进行精神文化侵略。在学校中,大力推行日语教育,派遣日

收稿日期:2022-02-08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革命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HB19MK023)。

作者简介:邵艳梅(1972-),女,河北青龙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王 霜(1998-),女,河北保定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本教师,培植特务组织,企图使中国青年一代,变成日本的顺民,变成任其宰割的绵羊。例如,雄县一完全小学,在特务教员的挑拨教唆下,240个学生中有230个加入了反共组织“忠勇团”,彻底丧失了民族意识;另外敌寇利用包围清剿策略,大肆捕杀冀中师生,只冀中武强、深泽等16个县,1940年春季“扫荡”中,教师被捕的就有135人,经群众保释或赎回的98人,生死不明者13人,壮烈牺牲者11人。^{[3](P33)}在这种情况下,加强人民群众的文化教育工作,有利于人民群众看清日本侵略者的真面目,揭露和摧毁敌人文化侵略的阴谋。

第二,是提高群众政治文化水平的需要。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抗日战争上升为全民族的解放战争,农民成为抗战的主力军。所以,动员群众参战成为首要任务,而民众的抗战积极性和历史使命感取决于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但从现实来看,在当时冀中教育相对发达的定县,7岁以上人口约30万人,其中识字者仅占17%,文盲比重高达83%。^{[4](P249)}根据地文盲比重大、民众文化素质低下会对抗战进程造成不利影响。例如,遭遇敌人突袭情报传递到村庄时,因无人识字而耽误战略转移;根据地民众在路口站岗通过盘查路条来为防止汉奸特务潜入根据地,但是由于一字不识,仅靠辨认纸条有无黑字红章来放行,导致汉奸特务趁机蒙混过关,对根据地造成极大破坏。此外,文盲众多、文化水平落后使得大多数群众不能正确理解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进而阻碍抗战进程,影响群众的抗战热情。因此,为使广大民众实地参加抗战,需要加强民众教育,提高民众对抗战的认识和抗战胜利的信心,以使他们从无知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迅速赶上抗战形势要求的一般水准。^[5]

第三,是动员群众积极参战的需要。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在冀中平原实行残酷的屠杀政策,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例如,“日军在占领正定县后,几天之内在城内和近郊10个村庄残杀群众1500余人,烧房106间。在藁城梅花镇制造‘九九惨案’,杀害全镇60%的人口,全镇550多户,有

46户被杀绝。”^{[6](P6)}在此国难当头之际,动员群众抗战救国尤为迫切。然而,在根据地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还存在一定困难。冀中沦陷后,国民党政府携款潜逃,并带走地方武装,导致溃兵土匪到处流窜,一时冀中陷入了极度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冀中民众把希望寄托于地主乡绅的联庄武装上。因此,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建立政权后,群众的乡村封建权威认识根深蒂固,对中央政权的疑虑仍然存在。抗战胜利的第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动员老百姓,要想动员群众,就必须施行教育工作。^[7]所以,只有通过教育与宣传,才能得到群众的了解、支持与信任,从而达到群众积极参与抗战的目的。

二、冀中抗日根据地社会教育的核心内容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2](P694)}教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决定,并为经济与政治的发展服务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冀中抗日根据地推行的社会教育是随着根据地的创建发展起来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各级政府根据晋察冀边区政府、边区教育厅和冀中教育科的指示,坚持一切教育内容为抗战服务的原则,在根据地开展了文化识字教育、政治教育、生产常识教育、军事常识教育等内容,群众从中学习和了解了抗日基本知识技能、激发了自身的参战热情、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一)文化识字教育

识字教育是社会教育的基本内容,以实现扫盲为主要目标。“文字是一种提高政治认识的重要工具,用它武装群众的头脑,势必会提高抗战民力。”^[8]冀中区政治主任公署颁布政令要求在根据地各通行处都设“识字牌”,派识字群众站岗教过路人识字。识字牌的内容涉及生产、民生、军事、思想等各方面。例如,1940年4月份识字牌应写字句表中有:保卫冀中、参加抗日军、春耕运动、站岗放哨等。5月份识字牌应写识字表中有:侦查敌

情、不当伪军、我是中国人、抗战到底等。在教育过程中,针对不同人群采取不同的教学形式。对一般失学青年男女采取识字班或者识字组的方式,以行政村为单位,建立识字组,每组由三至十人组成,每组推选出一个组长进行识字教学,时间主要是晚上,每天或者两天到三天学一次。对没有时间集中学习的群众,采取小先生教学法,由小学生担任教育家人和邻居的识字工作。通过文化识字教育,提高了群众的文化程度,结束了许多人民群众文盲和半文盲的历史,促进了根据地政策法规的贯彻实行和根据地的巩固发展。

(二)政治教育

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政治教育以抗战救国为核心,注重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充分调动了群众的参战积极性,掀起了冀中抗日的热潮。政治教育主要是通过冬学运动来实现的。教材方面,一般都以抗敌报、抗敌画报和各种抗战宣传品为材料,目的是启发民族觉悟,建立抗战信心。教材编写注意解决斗争的实际问题。以1942年的识字教材为例,面对敌人的“扫荡”“清剿”,编写《埋地雷》《互助》等。为坚定群众抗战胜利信心,粉碎敌伪欺骗宣传,编写《当心敌人放毒菌》《不要受骗》等。政治课程方面,以了解法西斯国家名称及他们侵略的目的、罪行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国家名称,正义战争目的、胜利条件,中国抗战形势,敌人对我根据地的阴谋破坏和我们如何防御为主。^[9]此外,于1942年普遍开展“公民誓约”运动,主要有不做汉奸顺民、不当敌伪官兵、不参加伪组织维持会、不替敌人汉奸做事、不卖给敌人汉奸货物等十条内容。^{[10](P178)}根据地的社会教育把爱国主义植根在人民心中,激发群众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对动员群众支援抗战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三)生产常识教育

社会教育是不脱离生产的一种补习教育,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冬学运动从保护粮食、生产工具、牲畜等关系到农民的利益方面展开,使群众理解站岗放哨、坚壁清野的重要性,引导农民参与到抗战中来。1943年春学教材中专门组织学习农业

生产常识,如浸种、堆肥、挖滩、打井、植树、育苗等。^{[11](P235)}除单独学习理论课程外,还注重“做什么教什么,学什么做什么”的方法。开展生产运动时,学习生产经验、生产技术、科学知识。打枣步曲时,学习枣步曲生活史和防治办法。此外,根据地社会教育还开展了生产节约教育、卫生教育、春耕秋收教育等。克服了群众生产劳动与社会教育之间的矛盾,丰富了群众的生产知识,改善了人民生活,促进了生产发展,巩固了根据地建设。

(四)军事常识教育

日本侵略者看中冀中抗日根据地对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的重要地位,采取“欲取华北,先确保冀中”的侵略战术,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大肆进攻,企图将其作为“东亚军事基地”。因此,根据地在社会教育中开展了大范围的军事常识教育。例如,在冀中“大扫荡”时期,冀中县区武装委员会组织群众学习爆破战,教人民使用手榴弹,学习地雷的构造以及埋地雷的方法;开展地道战时期,各区或中心村召集挖地道的青壮年教群众挖地道、地洞掩护自己。此外,还有交通站、地道战、坚壁清野、反扫荡、游击转移等教育内容。如1942年冬学课本《反对敌人的蚕食进攻》中学习什么是蚕食政策,敌人为什么采取蚕食政策,反蚕食的方法等。社会教育中的军事常识教育不仅能够教育群众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树立斗争信心,还掩护了大批抗战人员,为保存抗战有生力量做出了积极贡献。

三、冀中抗日根据地社会教育的基本形式

冀中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教育是不脱离生产劳动、面向全体群众的教育形式,群众在参与社会教育的同时也要做到不误工、不误农、不误战等,不同年龄、不同文化水平、不同工种的群众对社会教育的要求也有所不同,这就决定了社会教育形式不可能整齐划一,而是具有灵活性和机动性。^[12]除冬学、民校、技术训练班等基本的教学形式外,冀中抗日根据地还开办文化俱乐部来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使人民在娱乐中形成了独特的自我

教育模式,为群众参与社会教育提供了多种选择,提高了群众主动参与学习的积极性。

(一)开展冬学运动

冬学运动是在冬天农闲时间开展的,以政治教育和识字教育为主的社会教育形式。冀中抗日根据地成立冬学领导机构和冬学委员会,于1938年号召了第一次冬学运动。在教建会、各团体的努力配合下,在进步地区成立众多识字班和民众夜校,动员部分青年参加学习。据深泽等26个县统计,共开办民校450处,识字班1579班,入学文盲男生47965人,女生21861人,共69826人。^{[13](P194)}由于时局动荡和农民的保守思想,本次冬学运动主要以识字教育为主。1939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冀中抗日根据地在教育科长联席会议提出“继续开展冬学活动,深入宣传工作,提高民族政治水平”的号召。各县在联席会议方针政策指导下,训练冬学教师,编印大众千字课本,举办文娱活动,利用小学生制号召家长上冬学,引起了轰轰烈烈的冬学热潮。据27个县统计显示,共开办民校1971处,识字班4164班,增加男女学生283139人,相当于1938年学生总数的5倍。^{[13](P208)}两次冬学运动结束后,人们的文化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政治上坚定了群众坚持敌后抗战、建设根据地、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参加抗战工作的积极性。

(二)开办民众学校

民众学校是一种较为正规,具有一定强制性的社会教育形式,以扫盲提高人民文化知识,坚定民族意识为目的。为更好地进行社会教育,冀中抗日根据地召开第二届教育科长联席会议并提出:“每村设民众学校一处,全校设工人识字班,农民识字班,青年识字班,大众识字班,妇女识字班。”^{[13](P225)}根据地以村为单位由村委会主任、文建会主任和各宣教委员组织设立民校委员会,统一组织领导民校工作。首先,从识字程度和年龄方面对文盲进行了分类:识字300以下是文盲,300—1000为半文盲,1000以上为非文盲;15—25岁的为第一种文盲,26—35岁的为第二种文盲,

36—45岁的为第三种文盲,46岁以上的为第四种文盲。1940年冬,发动第一、二种文盲全部入学;1941年冬动员第三种文盲入学,最后动员第四种文盲入学,逐步肃清文盲。其次,冀中行署在文建会帮助下编撰了初级民校和高级民校的识字课本,内容为政治、自然常识、算数,从此冀中民众学校有了统一的课本。最后,冀中各县普遍训练民校教师,分别于1940年和1941年对一名和一到三名教师开展定期训练,训练内容为新民主主义教育、民校须知、政治形势报告、大众千字课本研究和教学法等。此次训练,大大提高了教师工作的积极性,民校的管理工作也取得了很大进步。据统计,1940年冬,冀中14个县共成立民校2136处,男生183021人,女生123071人,男女合计85823人,共计391915人。较1939年同27个县总数增加民校253处,增加学员59304人。^{[13](P227)}许多专区还建立了各种高级识字班,形成了识字热潮。民众学校在扫盲识字运动中成效显著,提高了一般群众的政治觉悟,促进了群众思想意识的转变。

(三)采用小先生制

为解决师资不足和扫盲缓慢的困境,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颁布的《小先生制教育实施方法》指出:“小先生制”是为增加教育功能以适应抗战形势的特殊教育方法。它以小学生为小先生,分别各自组织传习处,教授无法接受集中教育群众的基本知识。树荫、街道、家庭作为他们的授课场所。坚持“即传即知”的原则,把自己在学校学会的东西及时教给群众,授课对象主要是家人邻里。小先生通常利用家庭识字牌来教家人识字,一是在家里常见的物品上贴上与之对应的识字牌,如在锅上边贴上“锅”字的识字牌,在大门上贴上“大门”,在灶台上贴上“灶台”。二是直接在纸条上写要学的字句,如《冀中一日》中记载,“王大娘从柜子里拿出一叠纸条念到:共产党,八路军,认真优待抗属,扩大抗日根据地”。^{[14](P403)}小先生制教学法广泛地创造了识字的机会与环境,大大提高了群众的识字热忱。除教群众识字外,还通过读报组和做演讲的方式宣传抗战,用教唱歌和演戏的方式来丰

富人民的文娱生活、并组织打扫卫生来提高人们的卫生意识。人们在多种多样的教育形式中了解到抗战的目的和任务,懂得了读书的好处和讲究卫生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小先生制在抗战社会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小先生的宣传鼓动在活跃群众文化生活的同时也配合了抗战动员工作。不仅如此,小先生制的作用已经不局限于识字范畴,还为党的方针政策宣传构建了桥梁。

(四)创办技术训练班

为使广大农民群众掌握有关战争生产的具体技术,在根据地县区政府的主持下,开办了形式多样的技术训练班。军事上,举办地雷训练班,具体学习地雷的构造和埋地雷以及排查地雷的技巧。开展“地下建设”训练班,学习地道躲避和挖地道方法,如怎样伪装洞口,怎样挖战斗洞,怎样预防敌人放毒气,对地道战的顺利开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农业上,举办生产技术座谈会,聘请专业老农讲授种地施肥增产的方法,保证根据地在抗战时期的粮食供应。组织“纺织训练班”“军衣军鞋训练班”,通过冬学训练根据地青年妇女纺花织布,满足抗战的物资供应。此外,为提高根据地人民医疗卫生意识,除了进行一般的卫生教育宣传外,还积极组织妇婴卫生训练班,提倡新接生法并在根据地普及试行,大大降低了根据地妇婴的死亡率。技术训练班加强了群众的技能训练和动手能力,对战争动员和物资储备工作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五)建立文化俱乐部

抗战初期,为丰富农村群众的文化生活,便于进行时事政治教育,根据地在冀中文建会的组织下建立了文化俱乐部。文化俱乐部的本质是群众自我教育的一种形式,在自我教育过程中创造了几种有效的教育方法。一是读报组,其目的是通过读报了解时事政治。读报时间地点灵活多变,冬天晚上的饭铺、夏天歇晌的树荫都成为读报的据点。读报的人大多由群众自己推选,主要为小学教师、青年知识分子、私塾老先生。读报材料坚持与当前的中心工作密切结合并且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读报组不仅提高了农民群众的政治认识,也提高

了读者自身的阅读能力。二是黑板报,它是农民自创的一种舆论机关,黑板报的内容由农民投稿,村干部审查选稿后抄写在黑板或者黑墙上,出版时间一般为三天、五天、七天或不等。黑板报的内容以表扬、批评本村的事实为主,少登或不登已经讲过的新闻。有的县区在黑板报设置“行情栏”和“招寻启示”,颇受群众欢迎。第三是“高房广播”,在根据地起收音机作用的重要宣传工具,优点是传播消息迅速直接。尤其是在战争环境中,能够及时传达敌情。这些自我教育形式坚持了从群众的需要与自愿出发,采取因地制宜的办法,与实际斗争情况相结合,推动了宣传工作的开展,巩固了根据地政权。

四、冀中抗日根据地社会教育的特点

冀中抗日根据地在发展社会教育过程中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要求,结合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形成了一套适合根据地发展的教育体系,为争取抗战胜利和根据地建设培养了人才,在社会教育过程中呈现出独有的特质。

第一,坚持为抗战服务。冀中抗日根据地社会教育是在抗日战争大背景下开展的,始终坚持为抗战服务的工作导向。虽然不同时期社会教育的方针、教育内容、侧重点不尽相同,但都是为了通过社会教育唤醒群众,启发民智,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抗战。在“教育必须服务抗战”方针的引领下,社会教育的课程和教材内容都具有显著的战时性。从课程设置来看,主要围绕时政教育、军事常识教育展开,其他方面的课程相应的被缩短和取消,使得民众掌握抗战知识与技能。从教育内容来看,紧密结合抗战时局,分析敌人战术,普及救护常识,学习锄奸反特,着重提高根据地群众的自卫意识。在抗战紧缺人才的特殊时期,冀中社会教育始终坚持为抗战服务,培养了一批了解抗战知识与技能,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抗战分子,为抗战储备了大量的后备力量。

第二,社会教育形式多样。社会教育对象大部

分是根据地忙于生产劳动的青年男女,他们不可能完全脱离生产劳动去参加社会教育。因此,冀中抗日根据地运用灵活多样的社会教育形式去满足群众的实际需求。例如,为解决白天工作无法参加学习的情况,开办夜校;为解决半日劳动无法参与整天学习的情况,开办半日校;为解决半月劳动无法参加整月学习的情况,开办半月校。此外,根据不同群体、不同劳动时间开办冬学运动、民众学校、小先生制、文化俱乐部等适应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社会教育形式的可选择性和多样性提高了根据地群众的学习热情,有力地配合了抗战工作的开展。

第三,社会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社会教育坚持与生产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根据地教育建设至关重要。抗战时期,敌人对冀中地区进行多次扫荡,使得原本物产丰富的冀中地区变得资源极其匮乏,教育也跟不上政治环境。经济基础是社会得以发展的第一条件,要想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必须要做到教育与生产两不误。从教学内容来看,教授如何施肥、如何植树、如何种菜,注重培养动手能力,如修鞋、编织。从教学形式来看,组织农会训练班、生产学习小组等。为保证民食,提高生产,不少地区在冀中政府的领导下举办生产技术座谈会,请本村或者邻村劳动模范作报告,传授生产经验。面对敌人严密封锁、穿衣用线十分困难的情况,根据地组织青年妇女生产小组学习纺花织布再传授给其他群众。这种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满足了根据地群众的吃穿用需,不仅锻炼了根据地群众的生活能力,而且有效地推动了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

第四,妇女受教育比例提高。抗战前冀中地区妇女深受封建思想影响,地位低下,除少数城市以及富裕家庭的妇女外,绝大部分没有学习的机会。冀中抗日根据地社会教育通过开办妇女冬学、妇女夜校、妇女识字组等教育形式积极动员广大妇女参学,改变了妇女没有受教育权的现实情况。例如,在1940年的定县有妇女民众学校86处,学生4300人,妇女识字班42人处,学生2360人,妇女

识字组52组,组员180人。此外还有24处妇女冬学正在开办,有着1200多个渴望着上学的妇女。从整个冀中抗日根据地来看,参加学习的妇女占45.3%,常年民校女生占49.9%。^[15]冀中抗日根据地社会教育使广大妇女摆脱了封建束缚,提高了妇女的文化素质和政治觉悟,加快了根据地的妇女解放进程。

五、冀中抗日根据地社会教育的新时代启示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要把党的历史经验作为正确判断形势、科学预见未来、把握历史主动的重要思想武器,更好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16]抗战年代已经远去,但是冀中抗日根据地在开展社会教育过程中积累的先进经验对于当今开展社会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第一,坚持走群众路线。抗战时期,冀中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教育坚持从根据地群众的实际出发,其形式、内容以及时间都是根据群众的生产生活而定,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比如,俱乐部、民校选址往往是人口密集、路程短的地方;内容注重实用性以满足群众日常需要,像记账、种植、纺织;时间在中午、饭后、农闲时期。正因此,党和政府开办的民校、夜校、冬学、文化俱乐部,得到了根据地群众的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

当前,开展社会教育仍需坚持走群众路线。首先,教育内容要坚持从实际出发,针对不同群体、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展开不同的社会教育。例如,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来说,多开展实用性教育,如劳动法常识、福利政策、就业信息等。只有真正地排群众之所忧,解群众之所难,社会教育才会取得成效。其次,教育方式要灵活多样,根据不同人群,分不同时间安排,以不耽误群众日常生活和工作为前提,充分挖掘人民乐于参与的社会教育形式。最后,从群众中选任领导干部。群众的头脑中蕴含着无穷无尽的智慧,社会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有待

人民群众来丰富和完善。吸收群众直接参与社会教育管理,能够真切的了解群众对社会教育的期待、要求和建议,从而更新社会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这不仅能够提高群众参与社会教育的积极性,更有利于社会教育的顺利开展,让社会教育真正获得实效。

第二,提高对社会教育的重视程度。冀中抗日根据地社会教育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成效,关键在于党和政府对社会教育的高度重视。抗战时期,冀中抗日根据地为了提高社会教育的质量,出台了各种法律法规,改善教育质量,动员群众入学,推动了社会教育的顺利开展。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为保障人民群众的受教育权,提高广大群众的思想文化水平和道德素质,党和政府应该提高对社会教育的重视程度。首先,出台相关政策和法令,明确社会教育的目标、方向、任务、内容等,以此来增强社会教育的法治保障,促进依法治教。其次,加大社会教育的资金投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无比重视教育工作,为教育工作投入大量经费资金。但是,社会教育的经费投入比例远远低于学校教育。在新时代,政府应该加大社会教育的财政投入比例,同时也可以借鉴抗战时期的民办公助的方法促进社会教育的高效运行。最后,要加强社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和。党和政府要培养一批专门从事社会教育的人才,积极创办相关的社会教育教师培训机构,动员知识分子从事社会教育工作,提高社会教育从业者的福利待遇。

第三,社会教育形式要多样化。社会教育的开展相对于学校教育要复杂得多,开展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到每一个环节,否则其效果会大打折扣。冀中抗日根据地社会教育形式多样,有冬学运动、民众学校、识字班、夜校、俱乐部等。这些不同的形式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根据具体实际情况,在不影响群众生产劳动的情况下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运转。当今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日益增长,社会教育的形式也应该逐渐走向多元化。党和政府在开展社会教育时,要加强社会教育管理,注重发挥社会组织和

团体的作用。要加快对图书馆、科技馆、博物馆、文学馆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人民参与文化学习的积极性,提升文化素质。要建立相关的社会教育协调机构,如广播站、文化所、信息网络平台等,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接受新文化的实效性。

第四,完善社会教育制度和管理体系。冀中抗日根据地为保障社会教育能够正常运行,对社会教育的方针任务、组织领导、教师选聘、校址选设、经费开支等做了具体规定,还建立了严格的纪律制度和检查制度,相对完备的社会教育制度克服了社会教育战时情况下的随机性和任意性。从社会教育管理体系上来说,实行三级管理模式,行政区设行署、县设教育科、村设教育委员会,各机构各司其职、分工明确,避免机构之间的相互推诿。完善的社会教育制度和管理体系是冀中抗日根据地社会教育取得显著成就的重要因素。因此,当今社会也要制定健全的社会制度和完善的管理体系来开展社会教育。从完善社会教育制度方面来看,不能过于宽泛,要避免流于形式,也不能过于细致,防止脱离实际。要从人民的实际需求出发,确立社会教育的地位、目标、意义,保证政府对社会教育的经费支出和检查监督。从管理体系上来看,我国社会教育的管理主体有很多,如政府、学校、妇联等。但是,没有一个真正领头的管理机构指导社会教育工作的开展。社会教育主管机构的缺位,会造成社会教育陷入无法独立化、常态化发展的泥淖,形成只能依附于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社会实践等方式发展的现状。因此,我国有必要从上到下建立独立的社会教育管理机构来专门负责社会教育管理,并且要成立相关监督检查机构,定期对社会教育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以确保社会教育能够在不断发现问题中健康发展。

总之,冀中抗日根据地社会教育是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起来的。虽然在抗战环境中同时做到战争、生产、学习三不误是有一定困难的,但是冀中抗日根据地社会教育始终坚持教育为走群众路线、与生产结合、为抗战服务的原则,通过开展积极文化识字教育、政治教育、生产

技术教育和军事教育,培养了大批有思想、有文化、有技术的人才,有效地促进了根据地建设工作。此外,最大程度地改变了农村封建落后的社会风气,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在根据地中形成一种积极向学、乐于生产、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新

时期开展社会教育要汲取抗战时期总结的伟大经验,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从群众需求与自愿出发,关注社会中的特殊群体,引导群众进行自我教育,促进社会教育持久稳健发展。

参 考 文 献

- [1] 刘宪曾.陕甘宁边区教育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 [2]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 人民教育社.老解放区教育工作经验片段[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
- [4]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5] 关于开展冬学运动[N].抗敌报,1938-12-06(01).
- [6]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冀中抗日根据地斗争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
- [7] 艾思奇.使三万双睡眼睁开[N].新中华报,1941-04-19(04).
- [8] 三个半月来冬学运动的总结(中)[N].新中华报,1938-04-20(03).
- [9] 广泛开展冬学运动 公布冬学运动实施大纲[N].晋察冀日报,1941-11-19(04).
- [10] 曹剑英.晋察冀边区教育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4.
- [11] 王谦.晋察冀边区教育资料选篇:社会教育分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 [12] 新儒.冀中区的教育工作[N].新华日报,1942-08-27(02).
- [13]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冀中抗日政权工作七项五年总结(1937.7-1942.5)[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
- [14] 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委员会.冀中一日[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1.
- [15] 冬学与妇女[N].晋察冀日报,1940-01-07(04).
- [16] 习近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埋头苦干、勇毅前行[J].求是,2022,(1).

The Social Education and its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in the Central Hebei Anti-Japanese Base Area

SHAO Yan-mei, WANG Shuang

(School of Marxism,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401,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in order to mobilize the mass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war and raise their ideological and educational level,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social education, such as literacy education, political education, production technology education, and military science education, etc. in the central Hebei anti-Japanese base area. The social education was carried out through various ways, such as the winter school movement, the establishment of public schools, the Mr. Small system, the establishment of technical training class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ultural clubs. It has it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The social education in the central Hebei anti-Japanese base area raise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wareness of the locals as well as their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pushed the Anti-Japanese War to the final victory, and provides enlighte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ducation today.

Key words: Central Hebei anti-Japanese base area; Social education; Enlightenment

(责任编辑:江毓君)